

# 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的“群聚现象”

全晰纲 郑立娟

**摘要**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曲阜孔氏《阙里志》和颜氏《陋巷志》共经历过四次编修,邹县孟氏《三迁志》也三次修纂。孔、颜、孟三氏家族志的每一次编纂,都呈现出特殊且鲜明的“群聚现象”,具体表现为编纂时间前后相因,体例内容相互借鉴,编修人员交集并处,修纂意旨彼此关切。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孔、颜、孟三者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同时,明代尊崇儒学,志书修纂盛行和三氏林庙修建,也是促成这一现象出现的文化动因。

**关键词** 《阙里志》 《陋巷志》 《三迁志》 《孟志》 群聚现象 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 B248.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20)01-0092-11

**作者:**全晰纲,男,1962年生,山东郓城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齐鲁文化;郑立娟,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儒家文献。济南 250014

明代弘治之前曲阜孔氏、颜氏与邹县孟氏家族本没有独立的家族志,三氏族史合载于《孔颜孟三氏志》中。弘治十八年,专门记载孔氏族史的《阙里志》最先成书,此后记载颜氏族史的《陋巷志》和记载孟氏族史的《三迁志》也相继刊刻。从弘治十八年到崇祯十四年,前后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孔、颜、孟三氏家族志各自经过多次编修重刊。关于《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的纂修史实及版本问题,徐兰筠、刘玉平、杜泽逊和唐桂艳等人曾有文章进行论述<sup>①</sup>,一些著作也有所论及。但总体观之,对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编纂的已有认知仍有抵牾之处,纂修细节尚有待深入探讨;关于三志在纂修中过程的关系,尚未有专文论述。本文在详细考证明代《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编修过程的基础上,将三志的修纂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观察,揭示三志修纂过程中呈现出的“群聚现象”,并探讨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

## 一、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史事考辨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曲阜孔氏《阙里志》和颜氏《陋巷志》各经历过四次修纂,邹县孟氏《三迁志》也曾三次编修。由于编纂、刊刻历程复杂,版本多有亡佚,三志在明代的纂书过程、体例内容等

<sup>①</sup> 徐兰筠、崔俊艳、张延龄《孟氏家志的历次编纂及其长短得失》,载《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刘玉平:《关于〈三迁志〉版本》,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杜泽逊《四库存目圣贤志书版本考》,见《国际儒学研究》(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桂艳《清代山东刻书史》,济南,齐鲁书社,2016年版。

信息已然模糊不清,亟待考证辨误。

### 1. 明代曲阜孔氏《阙里志》的修纂

《阙里志》始纂于明朝弘治年间,弘治十八年李东阳作《〈阙里志〉序》,详载修书之事:

弘治甲子,重建阙里孔庙成,东阳奉敕代告,周览遐慕,欲为一书。……适闻提学副使陈君镐有事于此,因举以属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润饰,且以《孔氏实录》《孔庭纂要》《素王事纪》《世家》补钞本致之,以备采择。陈君乃参孔氏所藏《祖庭广记》与凡遗碑、断刻诸书所载,逾年而后成。……为卷十有三,为目十有四,为文累若干万言。<sup>①</sup>

正德元年陈镐所作《书〈阙里志〉后》也载著述之事“遂蒙以纂集下委,且俾具凡例,折衷损益,脱数稿而后定。又录致□阁本数种与孔氏诸书,参详考证,明年秋,书成。”<sup>②</sup>结合以上两篇序文可知,《阙里志》始纂于弘治十七年,李东阳主持,陈镐修纂,体例内容皆由陈镐厘定,次年修纂完成并刊刻成书。此次修纂,奠定了后世《阙里志》编修的基础与规模,然惜已亡佚。

关于弘治本《阙里志》的卷数与篇目,李东阳在序文中称有十三卷、十四目,但徐源在《〈阙里志〉后序》中记载此次修志共纂十三卷,包括《图像传》《世家》《事迹志》《林庙志》《门弟子》《礼乐志》《制敕》《撰述》《奏表》《铭志》等十目<sup>③</sup>。今检嘉靖本《阙里志》共分十三卷、十目,目次名称、排列顺序皆与徐源所述一致。嘉靖本《阙里志》是在弘治本的基础上修纂的,以此反观弘治本的体例内容,可以推定徐源的叙述是可信的。但孔承业为嘉靖本《阙里志》作序时称“至若记载之源流,凡例之曲当,李序备矣,兹不复赘。”<sup>④</sup>“李序”即指李东阳所作的《〈阙里志〉序》,孔承业称李东阳在序中已经对弘治本《阙里志》的体例内容记述完备,因此李东阳所载的篇目数量也应是正确的。另外,李东阳之序作于弘治十八年九月朔日,文中称“黄君绣归自京师,因畀之俾刻于阙里,置于所谓奎文阁者”;徐源之序作于弘治十八年十月朔旦,其中载“御史金君洪议出修庙余帑用钁诸梓,以诏后来”,二人序文之中皆述刻书之事,故二人所见之《阙里志》均是定本。李东阳与徐源的描述之所以会出现抵牾,应与二者对“目”的理解不同有关。嘉靖本《阙里志》中有些内容因篇幅较长而分为多卷,如《制敕》分为《制敕一》《制敕二》,《撰述》也一分为三。这种分卷情况在弘治本中也有可能出现,李东阳或是将其皆作为独立子目看待,而徐源则综合视之。若以李东阳的方法统计,嘉靖本《阙里志》共十三个子目,应是在弘治本十四个子目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嘉靖三十一年,孔承业等人重刊《阙里志》,并作《重刊〈阙里志〉序》记之:自李东阳创修《阙里志》至今,“旧刻虫耗磨灭者强半,……业自承乏以来,扼腕于悒者积日,每公事竣,辄退访吾宗人。弘干素声博雅者,资其丽泽,与之析贻订舛,葺残缀缺,竟即不惜废寿以铁笔。”<sup>⑤</sup>根据序文记载,可知此次重修工作由孔承业主持,孔弘干撰述。嘉靖本《阙里志》除将弘治十八年以后的内容续修入志外,还将颜、孟二族事迹析出,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曲阜孔氏家族志。但根据前文考证,在纂修体例上孔弘干较陈镐并无太大改进。

万历年间,孔贞丛主持再修《阙里志》,并撰《新志纪因》记之:

岁在午未,家居读礼,得以其暇,窃取前志,谬自点窜。无关圣道者,虽文弗录。有系

① 李东阳《〈阙里志〉序》,见孔承业、孔弘干等编《阙里志》,明嘉靖刻本。

② 陈镐《书〈阙里志〉后》,见孔承业、孔弘干等编《阙里志》。

③ 徐源《〈阙里志〉后序》,见孔承业、孔弘干等编《阙里志》。

④⑤ 孔承业《重刊〈阙里志〉序》,见孔承业、孔弘干等编《阙里志》。

圣泽者,虽复必详,分为十汇,计若干卷。又不敢执己见以邻于隘也,爰开局于祖庙之侧,广集众识。裁定则致仕广文族兄贞栋、校阅则西陵王君成位、清源刘君尔硕,而茂才尚焯、贞对、毛凤翔,实共成之。期年而功始告竣。<sup>①</sup>

根据序文记载,万历重修《阙里志》由孔贞丛主笔,孔贞栋、王成位、刘尔硕等多人协同修订。黄克缙曾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年)为此书作序,并在序中称“书成,孔君请缙为之序”<sup>②</sup>,那么孔贞丛所言“岁在午未”,应指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年)至三十五年(丁未年)之间,而书应纂成于万历三十七年,只是序中未言刻书之事。万历三十九年,陈瑛以山东按察使提学副使的身份来谒阙里,为《阙里志》作序时,值其来鲁“罄一年”<sup>③</sup>,因此万历本《阙里志》刊刻完成时间的上限应在万历四十年。

万历本《阙里志》共分十目、十二卷,对旧有体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视旧志,存者什之六,黜者什之四,增者什之二三。”<sup>④</sup>与嘉靖本《阙里志》所列子目相比较,本书《世家志》中并入了原《事迹》的内容,析出部分内容创设为《人物志》;原《林庙志》被分为《山川志》《古迹志》和《林庙志》三部分,略显繁冗;另从原书各目中集出相关内容创为《恩典志》;原《制敕》《撰述》《奏表》《铭志》合并为《艺文志》,使得体例更加简明。鉴于孔贞丛在纂修体例、内容等方面的合理创新,陈瑛称该书“属词分类详而核,文而有则,俨然成一家言者也”<sup>⑤</sup>;黄克缙赞其为“圣书之箕裘,述作之冠冕也”<sup>⑥</sup>。

崇祯年间,《阙里志》在六十五代袭封衍圣公孔胤植的主持下进行第四次修纂,杨士聪作《重修〈阙里志〉序》记之“再三研订,纲目无改于旧,而提笔纂要,斥膺登遗,荟为全书。”<sup>⑦</sup>实际上,崇祯本《阙里志》在体例上与前几个版本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将万历本《艺文志》的内容重新恢复,并析出《历代诰敕》《明朝诰敕》《御制祭文》《御制赞》《明朝碑记》等多个子目,虽在补充史事、资料上有所进益,但体例更为冗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时也说“编次冗杂,颇无体例。如《历代诰敕》、《御制文赞》不入《追崇恩典志》,而另为提纲。《碑记》本《艺文》中一类,乃别增《撰述》一门,均为繁复”。

关于崇祯本《阙里志》的成书时间,杜泽逊考证,“杨序无年月,署‘赐进士第’,士聪崇祯四年进士,知此序在崇祯四年后。”<sup>⑧</sup>杨士聪的序中还记载“公今者纂修竣事,且以一函告成于先圣之庙”<sup>⑨</sup>,可知杨士聪作序时《阙里志》已经完成纂修,并刊刻成书,但刊刻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

## 2. 明代曲阜颜氏《陋巷志》的修纂

接弘治末年《阙里志》修书之踵,曲阜颜氏家族开始纂修《陋巷志》。正德二年,陈镐作《〈陋巷志〉序》将首刻之事记录如下:

正德纪元,侍御郑州曹公奉命按视山东,祇谒先圣阙里,遂谒先师庙,访遗址而问志焉。太博公铤以未有专志对,公曰“诚缺典也,宜亟成之,而以‘陋巷’名书。”既而太博录事迹、诗文于公,猥以属稿,俾为荃次。凡八卷,其义例多取诸《阙里志》,明吾先师与先圣一道,不容差殊。至于卷帙多寡,则据所见闻,非敢详略也。刻成,公复属稿序诸首简。<sup>⑩</sup>

根据陈镐序文记述,《陋巷志》的编纂发轫于正德元年,由侍御曹来旬发起,颜公铤撰写,陈镐选编

①④ 孔贞丛《新志纪因》,见孔贞丛等编《阙里志》,明万历刻本。

②⑥ 黄克缙《重修〈阙里志〉序》,见孔贞丛等编《阙里志》。

③⑤ 陈瑛《序言》,见孔贞丛等编《阙里志》。

⑦⑨ 杨士聪《重修〈阙里志〉序》,见孔胤植等编《阙里志》,明崇祯刻本。

⑧ 杜泽逊《四库存目圣贤志书版本考》,见《国际儒学研究》(第五辑),第224页。

⑩ 陈镐《〈陋巷志〉序》,见陈镐等编《陋巷志》,明正德刻本。

次。另据正德三年李逊学《〈陋巷志〉后序》记载“右颜子《陋巷志》一帙共八卷,前侍御郑州曹公伯良托旧提学宪副陈镐宗之,汇集古今事迹而成之也。”<sup>①</sup>故知此次编纂的实际负责人乃是陈镐。

陈镐序中称“刻成,公复属镐序诸首简”,可知《陋巷志》在正德二年时已经刻成,今国家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都藏有明正德刻本《陋巷志》。有学者认为《陋巷志》编修完成后一直以手稿传承,万历二十九年方有刻本<sup>②</sup>,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此外,万历二十九年杨居寅所作的《刻〈陋巷志〉旧序》称“而旧刊有序,作者诚不可使之湮灭无传。”<sup>③</sup>虽不知“旧刊”指哪一版本,但足以说明万历二十九年《陋巷志》就已有刻本流传。

嘉靖二十九年,山东按察司佥事史鶚重修《陋巷志》,“乃仍旧名以附志于前人耳。至于按名覈实,缘有证无,补缺订谬,去冗删烦,尚有赖费子。予不敢掠其美也,是为序。”<sup>④</sup>由此推之,史鶚在此次修订中所做的工作有限,“费子”才是最为重要的纂修者。关于此次纂修的内容,万历重修《陋巷志》时于慎行言道“陋巷旧志自正德初年成于学使陈公,采摭草荆,尚有阙遗,历载相沿,莫之损益,览者惜焉。”<sup>⑤</sup>可知此次编纂对正德本《陋巷志》改易不多。

万历年间,监察御史杨光训因《陋巷志》旧志“事辞朴略,体裁未备,私窃少之”<sup>⑥</sup>而发起重修事宜。据万历二十九年于慎行《〈陋巷志〉叙》记载“万历庚子,侍御关西杨公行部至鲁,展礼庙庭,询诸翰博士颜君。胤祚博采旧闻,列为条目。下记郡伯豫章陈侯质之旧史,因其词事,稍加缘饰。司理长沙周侯摄篆,复加综校,以付梓人,有成书矣!”<sup>⑦</sup>由上可知,此次重修起于万历二十八年,次年刻成,由杨光训主持,颜胤祚主笔,于慎行等人参与编纂。关于此次修纂的体例内容,杨居寅在《刻〈陋巷志〉旧序》中称“斯志也,其本之旧志实多。”<sup>⑧</sup>虽然如此,颜胤祚等人在编修时还是做了大量有益的革新,使《陋巷志》的体例内容渐趋完备,成为后世重修、补刻、翻刻的重要范本。

崇祯十四年,吕兆祥重修《陋巷志》,颜光鲁参考,颜绍统订阅。《四库全书总目》评介此书曰:“正德中,提学副使陈镐始为作志。万历中,御史杨光训又续编辑之。而兆祥是编,盖因二家之本,重为订定。”<sup>⑨</sup>然吕兆祥所做工作十分有限,杜泽逊指出“崇祯间吕兆祥重修,据王重民与万历二十九年版比勘,知系旧版修补重刷,卷端署名改刻为吕兆祥重修”<sup>⑩</sup>。

### 3. 明代邹县孟氏《三迁志》的修纂

孔子、颜子、孟子文化渊源颇深,弘治、正德年间曲阜孔、颜二族相继纂修了各自的志书,而邹县孟氏家族却无专志。嘉靖年间,山东按察司佥事史鶚有感于斯,遂于嘉靖三十一年发起纂修《三迁志》,并作《〈三迁志〉序》详载此事:

予观兵东鲁,幸睹孟子庙貌,吊其遗冢,礼其后裔,足慰平生。景仰之私,及扣其志,乃曰尚未有专制者,予为之慨然。乃命教官费子增遍考群籍,删烦存要,集为全帙。予又重

① 李逊学《〈陋巷志〉后序》,见杨光训、颜胤祚等编《陋巷志》,明万历刻本。

② 《东方圣城曲阜》编写组编《东方圣城曲阜》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8页。新编《陋巷志》编纂委员会编《陋巷志》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321页。沈效敏主编《圣人家世》上册,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

③⑧ 杨居寅《刻〈陋巷志〉旧序》,见杨光训、颜胤祚等编《陋巷志》。

④ 史鶚《〈陋巷志〉序》,见杨光训、颜胤祚等编《陋巷志》。

⑤⑦ 于慎行《〈陋巷志〉叙》,见杨光训、颜胤祚等编《陋巷志》。

⑥ 杨光训《〈陋巷志〉叙》,见杨光训、颜胤祚等编《陋巷志》。

⑨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九《史部十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⑩ 杜泽逊《四库存目圣贤志书版本考》,见《国际儒学研究》(第五辑),第228页。

加订正 补其缺 正其讹 ,……书成 乃僭题其名曰《三迁志》 盖取孟子作圣之功 由于母氏蒙养之正云耳。<sup>①</sup>

由上述可知 史鶚发起修纂工作后 主要工作皆委以费子增。据《首都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介绍 嘉靖本《三迁志》共六卷,“卷一刊图。卷二列出处事迹、史记列传、宗子世系、历代授官恩泽、历代闻达子孙、庙宇、林墓、户役、封号、章服、祀典、给田、免役、门弟子封爵。卷三录诏敕、恩赐、表。卷四为奏疏、文移、祭文、赞、诗。卷五为碑记一。卷六为碑记二、墓志。”<sup>②</sup>然此次修纂 体例内容并不完善 周希礼在《〈孟志〉后序》中记载胡继先之语“孟氏故有志 疏甚不可以观。”周希礼也评价嘉靖本《三迁志》说“旧志之疏 犹无志也。”<sup>③</sup>

万历年间 邹县县令胡继先主持再修孟氏家族志 并将《三迁志》改名为《孟志》。据胡继先《〈孟志〉引》记载“余自受事以来 每谒诸长老以修订勳者屡矣。”“岁庚戌之春 观察潘君以是方文献暂休沐于里中 而孝廉周君复以博综尔雅佐之 遂乃极意厘正 分类编摩。……综其卷有五 列其目二十有一。”<sup>④</sup>可知 胡继先有意修纂《孟志》已久 万历三十八年方委潘、周等人正式纂修。万历本《孟志》中有潘榛、周希礼二人所撰《〈孟志〉后序》 故“潘君”即指山西副使潘榛,“周君”乃指孝廉周希礼。另据万历三十九年潘榛撰写的《〈孟志〉后序》所言“肖山侯乃捐俸授梓 梓既竟 余更读一过。”<sup>⑤</sup>可知万历三十九年时,《孟志》已经刊刻成书。

万历本《孟志》较之前的《三迁志》多有创新。潘榛曾言“孝廉亦雅意著述 于是不循旧《志》,尽发素所藏书 协力披录。”<sup>⑥</sup>具体观之,《孟志》改嘉靖本六卷为五卷 体例始于《地灵》 终于《杂志》 凡二十一个子目 较嘉靖本《三迁志》多有变化。《孟志》的缺陷也十分明显 李日华在《〈三迁志〉序》中称该书“事近摭而远漏 文安俚而失雅 体例胪列 未及议裁 征引勾稽 未及诣覈。”<sup>⑦</sup>其中虽有贬低过甚之嫌 但亦足以看出《孟志》著述不精。

天启年间 吕元善及其子吕兆祥、孙吕逢时重纂《三迁志》。此次修纂 历程较为复杂。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三迁志》乃明吕元善撰,“盖因史鶚、胡继先二家旧本为之订补。未脱稿而元善殉寇难 其子兆祥、孙逢时 乃续成之。”<sup>⑧</sup>另据吴麟瑞《〈三迁志〉序》记载“不数年而妖莲祸作 贤胤一门三世伏节 并家志毁焉。乃幸冠洋有子圣符 出父所作 再勤订阅” 最终刻成书籍<sup>⑨</sup>。结合以上序文记载可知 白莲教作乱之时 孟承光与吕元善(字冠洋)等人罹难 元善之子兆祥(字圣符)继承家父遗稿 与其子吕逢时续修成书。根据《三迁志》记载 天启二年孟承光“值妖贼之变 不屈而死之”<sup>⑩</sup> 那么吕元善始撰《三迁志》应在天启二年或之前。

关于吕兆祥刊刻《三迁志》的时间 天启六年吕澹为该书作序时称“顷邹滕乱起 孟胤三叶与家乘俱亡。弟与儿时力搜辑 倾囊梨绣 惟兄冠以名章以副。”<sup>⑪</sup>根据此序记述 吕兆祥在天启六年

① 史鶚《〈三迁志〉序》,见史鶚等编《三迁志》,明嘉靖刻隆庆增补本。

② 首都图书馆编《首都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③ 周希礼《〈孟志〉后序》,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明崇祯刻本。

④ 胡继先《〈孟志〉引》,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⑤⑥ 潘榛《〈孟志〉后序》,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⑦ 李日华《〈三迁志〉序》,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⑧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九《史部十五》。

⑨ 吴麟瑞《〈三迁志〉序》,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⑩ 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卷三中《宗子世系》。

⑪ 吕澹《〈三迁志〉序》,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就已完成对亡父旧稿的整理,“倾囊梨绣”则证明此时已经刊刻。天启七年李日华《〈三迁志〉序》中也评价吕氏“两世一心,以翼圣真,宁仅仅簸膏馥于铅槧也者?”“铅槧”即指刻书。因此,认为吕元善本《三迁志》初修于天启五年、付梓于崇祯元年<sup>①</sup>的观点是错误的。该书在崇祯年间也曾刊刻,孔胤植、吴麟瑞、虞廷陞、施凤来等人皆在崇祯元年为之作序。

今观吕元善编修本《三迁志》,全书五卷、二十一目,卷数、名目与万历本《孟志》相同。有学者研究后发现,天启本《三迁志》与万历本《孟志》相较,“增删相抵都不过一千多字”<sup>②</sup>。清康熙年间孟衍泰再修《三迁志》时仅称“海盐吕子捐资剞劂”<sup>③</sup>,而不言吕元善父子修书之原因或在于此。

## 二、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群聚现象”的频繁出现

通过前文考证可知,明代《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的修纂频繁而复杂。如果深入考察孔、颜、孟三氏家族志在明代的纂修历程,我们会发现三者修纂过程中各志的编纂时间前后相因,内容体例相互借鉴,纂修人员交集并处,纂修意旨彼此关切,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群聚现象”。

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过程中的第一次“群聚现象”,出现在弘治末年至正德初年《阙里志》和《陋巷志》的编修中。弘治十七至十八年李东阳创修《阙里志》时,陈镐作为主要的撰述者,厘定了该志的体例和内容。几乎与此同时,第一部《陋巷志》也开始修纂,并于正德二年刊刻完成,时间上仅比《阙里志》的初刊晚了两年,实际纂修者亦是陈镐。更为重要的是,陈镐在《陋巷志》的编纂过程中,充分借鉴了《阙里志》的纂修经验“其义例多取诸《阙里志》,明吾先师与先圣一道,不容差殊。”<sup>④</sup>这不仅说明正德本《陋巷志》的体例内容,是对弘治本《阙里志》的效仿,还体现出曲阜颜氏模仿孔氏修纂家族志的动机,在于强调颜回与孔子、颜氏与孔氏的特殊关系。加之编纂时间前后相因,主要撰述者彼此交集,二志修纂中的“群聚现象”展露无遗。

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过程中的第二次“群聚现象”,出现于嘉靖中后期。嘉靖二十九年,史鶚主持重修《陋巷志》,实际工作主要由“费子”进行;嘉靖三十一年,孟氏《三迁志》创修刊刻,主持者亦是史鶚,主要编纂者“教官费子增”(即费子)。鉴于二者编纂时间前后接近,主要编纂者相同,嘉靖本《陋巷志》与嘉靖本《三迁志》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

关于《三迁志》的修纂源起,史鶚在《〈三迁志〉序》中说“吾孔、颜、曾、孟,圣贤相继,而作又人文之至盛者,《史记》尝列传矣,犹病其不专而不详。我朝西涯李公始纂《阙里》以志孔世,详矣而不精;侍御曹公再纂《陋巷》以志颜世,专矣而未详。”<sup>⑤</sup>可见,正是因为孟子与孔子、颜回的特殊关系,以及《阙里志》与《陋巷志》的编修,史鶚才效仿孔、颜二氏修纂记载孟氏家族历史的《三迁志》。这种效仿,还体现在嘉靖本《三迁志》编纂体例上。根据《首都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对嘉靖本《三迁志》的介绍,可知其篇目分类方法、名称虽与已修的《阙里志》和《陋巷志》有所差异,但所涉及的内容皆在后者涵盖内容之内,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一脉相承的特征十分明显。

同在嘉靖三十一年,孔承业等人重刊《阙里志》。今考,孔承业《重刊〈阙里志〉序》作于嘉靖三

① 刘玉平《关于〈三迁志〉版本》,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

② 徐兰筠、崔俊艳、张延龄《孟氏家志的历次编纂及其长短得失》,载《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

③ 孟衍泰《〈三迁志〉后跋》,见孟尚桂、孟衍泰等编《三迁志》,清雍正刻本。

④ 陈镐《〈陋巷志〉序》,见陈镐等编《陋巷志》。

⑤ 史鶚《〈三迁志〉序》,见史鶚等编《三迁志》。

十一年仲秋八月,根据序文描述,此时《阙里志》已经重编完成。史鶚为初编《三迁志》作序是在嘉靖三十一年九月朔日,是时《三迁志》也已成书。该年季冬孔弘干作《重刊〈阙里志〉后序》,记载此次编纂中“不限阙里者,略为删裁,若颜子者,有《陋巷志》;孟子者,今饬戎鼎山史公所集《三迁志》悉矣,兹不复赘。”<sup>①</sup>根据上述序文记载,初编《三迁志》刊刻略早于嘉靖本《阙里志》,但二者的编纂时间存在交集。

嘉靖本《阙里志》与《三迁志》的密切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二者编纂时间接近。此次重修《阙里志》,孔弘干在纂修体例上全部因循弘治本。但考虑到《三迁志》经过弘治初刻以及嘉靖重修,已渐趋完善,孟氏《三迁志》也借鉴孔、颜家族志的修纂创修完成,弘治本《阙里志》中附带的颜、孟二族历史因失去存在价值而被删除,这是嘉靖本《阙里志》较弘治本最大的变动。由此看来,嘉靖年间重修《阙里志》除了原版残破的原因外,主要是对当时《陋巷志》与《三迁志》编修的回应。

孔、颜、孟三氏修志历程中的第三次“群聚现象”,出现在万历年间。万历二十八年杨光训重纂《陋巷志》,次年刻成书籍。根据于慎行《〈陋巷志〉叙》记载,修纂过程中“司理长沙周侯摄篆”,“周侯又尝有意重修阙里之籍,并及曾、孟,勒为一书,甚盛图也。颜志先成,除书至矣。”<sup>②</sup>“周侯”作为主要的编纂人,在编纂完成颜氏《陋巷志》后,又想编纂孔氏、曾氏、孟氏家志,即可看出《陋巷志》的修纂在主观上并非是孤立的。而这种欲将孔、颜、孟等圣贤门第家族志联合修纂的意图,应是明代《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在编修过程中出现“群聚现象”的直接原因。

接《陋巷志》修书之踵,自万历三十四年始,孔贞丛主持修订《阙里志》。《新志纪因》中言“至若尧祠、昊陵、颜巷、孟邻,自有邑乘与伊各志在,兹不复赘及云。”<sup>③</sup>这是《阙里志》在此次修纂过程中表现出的对《三迁志》和《陋巷志》的关切。另值得注意的是,万历本《陋巷志》在刻书时曾将正德二年李逊学所作《〈陋巷志〉后序》,由“贞白子”朱颐琢重新书写后刊刻。孔贞丛重纂《阙里志》时也请朱颐琢作序,这应是对万历本《陋巷志》的一种效仿,也暗示着二者的修纂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与嘉靖年间《阙里志》《三迁志》几乎同时纂修的历史情境一样,万历三十七年《阙里志》成书后,次年胡继先委潘榛、周希礼等人正式纂修《三迁志》,并改名为《孟志》。如果说嘉靖年间《阙里志》的修纂是对《三迁志》编修的回应,那么此次编修则可视为《孟志》对《阙里志》的模仿。黄克缙作《〈孟志〉前序》时就曾明言“孟之有志也,仿《阙里志》而为之也”<sup>④</sup>;胡继先也称《孟志》为“孟氏之实录,阙里之敌派也”<sup>⑤</sup>,二者都旨在申明《孟志》与《阙里志》相互因袭的关系。另外,黄克缙在为《孟志》作序之前,已为万历本《阙里志》作序。这一现象所体现的内在逻辑,与前文所述《阙里志》和《陋巷志》同请朱颐琢作序一致,皆在于加强两部志书的内在联系。

万历本《孟志》在编纂过程中也汲取过《陋巷志》的编纂经验。由于孟氏自孟尝、孟敏之后,世系不明,“或曰《陋巷志》中如之推、鲁公辈悉皆具载,何疑于孟氏”<sup>⑥</sup>,这实际上是欲效仿《陋巷志》将世系补全。但由于琅邪颜之推一系迁移事迹史书备载,而孟氏缺乏切实资料,“固不借贤于前代

① 孔弘干《重刊〈阙里志〉后序》,见孔承业、孔弘干等编《阙里志》。

② 于慎行《〈陋巷志〉叙》,见杨光训、颜胤祚等编《陋巷志》。

③ 孔贞丛《新志纪因》,见孔贞丛等编《阙里志》。

④⑥ 黄克缙《〈孟志〉前序》,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⑤ 胡继先《〈孟志〉引》,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以为重也”<sup>①</sup>。总体观之,万历年间《陋巷志》《阙里志》和《三迁志》在修纂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效仿与呼应,形成典型的“群聚现象”。

孔、颜、孟三氏家族志在修纂过程中的第四次“群聚现象”,出现在天启、崇祯年间。天启末年,吕元善、吕兆祥等人重修《三迁志》;崇祯十四年,吕兆祥又重修《陋巷志》。实际上,天启、崇祯年间,吕元善、吕兆祥父子一共修纂了多本志书。根据天启六年吕澹所作《〈三迁志〉序》记载,吕元善到鲁之后“先续通乘,专志《圣门》,兼为《三迁》,增订前后,展翫不翅,书开千卷,纸浣万番,笔堪成冢者。”<sup>②</sup>崇祯二年,孔胤植作《〈宗圣志〉序》时也称“吾东鲁诸志,或特创或增修,出吕藩参父子苦心勤手者,始自癸丑,至于己巳,十七年间成有二十余部,而《圣门》最先,《宗圣》极后。”<sup>③</sup>由吕澹和孔胤植的序文可知,自万历四十一年到崇祯二年,吕元善、吕兆祥父子勤于修志,十七年内成书二十余部。有感于吕元善修志之多,吕澹感叹到“我从父有千手眼耶,而何著记若斯之富也。”<sup>④</sup>或许由于修书太多,吕元善父子所修颜、孟二氏家族志的水平并不甚高,天启本《三迁志》较万历本《孟志》增修部分微乎其微,崇祯本《陋巷志》也只是对万历旧版进行修补重刷。

吕元善父子修纂的众多志书中虽然没有《阙里志》,但吕元善曾修纂过记载曲阜孔氏历史的《圣门志》。该书与《阙里志》的性质、特征一样,只不过又将颜、孟二氏历史加入其中,同时还添入曾、东野和仲氏三弟子家族历史。《圣门志》成书于万历四十一年,较万历年间孔、颜、孟三氏修志甚近,加之该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对《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都进行了充分的借鉴,故应是受到了这一“群聚现象”的影响。吕元善父子在编修《陋巷志》和《三迁志》时,也体现出对孔、颜、孟三氏家族志彼此间的关照。如李日华言“称《三迁》者,实以媲于《阙里》《陋巷》,而根宗母教矣!”<sup>⑤</sup>贺万祚也说“吕太学圣符,以尊君藩理季可手志《圣门》崇祀阙里,因念明禋及父之隆殊,感四氏从曳之德,爰为倾囊,订镌厥志,仍复‘三迁’之旧。”<sup>⑥</sup>以上信息皆体现出,包括《陋巷志》《三迁志》在内的诸多圣贤家族志书的修纂,乃是一个相互关切的整体,它们彼此紧密联系,共同反映出修志过程中的群聚性特征。

崇祯四年之后,孔胤植重修的《阙里志》刊刻成书。孔胤植在明末刻书甚多,如天启二年纂成《孔氏族谱》,崇祯年间刻《孔丛子》《圣迹图》,《阙里志》只是明末孔胤植刻书的一部分。崇祯本《阙里志》的修纂与吕元善父子修纂《圣门志》《阙里志》和《三迁志》是否存在关系,纂者虽未在序跋中提及,但三者编纂时间如此接近,内容又紧密相关,且孔胤植还曾为崇祯元年曲阜刻本《圣门志》作序,吕氏父子修书对孔胤植重纂《阙里志》所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综上所述,从修纂时间、作者、体例,以及编修意旨等方面来看,明代《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的编纂呈现出明显的“群聚现象”。诸志每次编纂的时间都十分接近,是“群聚现象”最为明显的表象;主要修纂者交集并处,使该现象所体现的诸志间的关系更加深刻;体例内容相互因袭,编修意旨彼此关切,则是“群聚现象”最为根本的内涵。总体言之,“群聚现象”体现出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在纂修过程中的紧密联系,并在这一时期贯穿三志编修的始终。

① 黄克缙《〈孟志〉前序》,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②④ 吕澹《〈三迁志〉序》,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③ 孔胤植《〈宗圣志〉序》,见吕兆祥等重修《宗圣志》明崇祯刻本。

⑤ 李日华《〈三迁志〉序》,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⑥ 贺万祚《〈三迁志〉序》,见吕元善、吕兆祥重修《三迁志》。

### 三、孔、颜、孟三氏修志“群聚现象”出现的文化动因

明代《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的每一次修纂都呈现出明显的“群聚现象”，这说明该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鉴于三志在编修过程中频繁且深层次的互动，我们可以将每一次修志都视为一种集体行为。该集体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文化背景，就是孔子、颜回和孟子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这正是孔、颜、孟三氏家族志在修纂过程中频频出现“群聚现象”的根本原因。

《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在明代修纂过程中频频出现“群聚现象”，是中国志书修纂史上较为罕见的情形。实际上，这种“群聚现象”在三志成书之前就已形成。明成化年间刘濬编纂《孔颜孟三氏志》时，就将曲阜孔氏、颜氏和邹县孟氏三个家族的历史汇为一志，“以其圣贤所生，同为一乡故也”<sup>①</sup>。《孔颜孟三氏志》虽然编纂较简，但所涉及的体例内容皆为后来三氏纂修家志时所承袭，奠定了《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修纂的基础，同时也是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过程中“群聚现象”出现的源起。刘濬将孔、颜、孟三氏家志汇为一志，除因三氏“同为一乡”的地缘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孔子、颜回和孟子分别是儒家文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三者又是不可分割的文化共同体。陈镐在编纂弘治本《阙里志》时继承了刘濬的编纂思想，该书虽为孔氏专志，但“其法以阙里为主，附颜、孟诸弟子之名氏事行”<sup>②</sup>，昭示孔子、颜回和孟子乃是道统一系，三者互联互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既是必须继承的历史遗产，也是修纂者的主观意愿，同时影响到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群聚现象”的出现。

孔子地位隆宠，徐源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赖孔子而后明”；“孔子之道如天地之大”<sup>③</sup>，因此需要修志以昭后来。陈镐也认为“吾夫子之道，其犹天地日月乎，其大且明者，固亦无待于言。”<sup>④</sup>《阙里志》修纂的深层原因在于彰显孔子和儒家文化，《陋巷志》和《阙里志》在修纂时，也无一不向孔子靠拢。如陈镐在叙述正德本《陋巷志》的修纂源起时言“先师上智大贤，发吾圣人之蕴以教万世无穷者哉，此志之所由作也。”“其义例多取诸《阙里志》，明吾先师与先圣一道，不容差殊。”“若吾先圣之道在万世，则先师之功亦在万世。”<sup>⑤</sup>李逊学作《〈陋巷志〉后序》时也曾言“孔门从游三千，而刚明能粹，独能入室以传圣道者，惟先师颜子一人而已。”“孔子得升尧舜之位，则颜子当与稷契众叟匹。”<sup>⑥</sup>于慎行为万历本《陋巷志》作序时评价颜回“尝溯道统之源，自尧舜汤文，至于宣子用集厥成，而颜子发其精蕴以教万世，盖所谓见而知之者焉。”<sup>⑦</sup>杨光训称《陋巷志》的编纂，使得“圣真道统，昭昭乎可考矣！”<sup>⑧</sup>方沆《刻〈陋巷志〉旧序叙》则说“出则禹稷同道，处则孔颜同乐。”<sup>⑨</sup>以上诸序，都旨在说明颜回是孔子道统的继承者，二者在儒家文化中是不可分割的，借此巩固颜回在儒家

① 刘濬《〈孔颜孟三氏志〉序》，见刘濬、张泰等编《孔颜孟三氏志》明成化刻本。

② 李东阳《〈阙里志〉序》，见孔承业、孔弘干等编《阙里志》。

③ 徐源《〈阙里志〉后序》，见孔承业、孔弘干等编《阙里志》。

④ 陈镐《书〈阙里志〉后》，见孔承业、孔弘干等编《阙里志》。

⑤ 陈镐《〈陋巷志〉序》，见陈镐等编《陋巷志》。

⑥ 李逊学《〈陋巷志〉后序》，见杨光训、颜胤祚等编《陋巷志》。

⑦ 于慎行《〈陋巷志〉叙》，见杨光训、颜胤祚等编《陋巷志》。

⑧ 杨光训《〈陋巷志〉叙》，见杨光训、颜胤祚等编《陋巷志》。

⑨ 方沆《刻〈陋巷志〉旧序叙》，见杨光训、颜胤祚等编《陋巷志》。

文化中的地位。

《三迁志》的编纂者也极力申明孟子对于孔子道统的继承和对儒家文化的贡献。史鶚为嘉靖本《三迁志》作序时,言称孔子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统,“一传于颜而不久,再传于曾而未大,三传于子思之门而得孟子者。……孟子以命世亚圣之才,挺然以传道为己任。……天下后学者,晓然知宗孔子而不惑于异端之非者,大抵皆其力也。……孔子之道,孰与传之哉?信乎有功于孔子而力寔倍于颜、曾,昌黎谓其功不在禹下,意者又在于此。”<sup>①</sup>史鶚在《孟庙告文》中也言到“道统攸传,愿学孔子,扶植之力,颜曾莫比。”万历年间重修《孟志》时,黄克缙评论孔子与孟子的关系时说“兼言孔孟,则孔子日也,孟子月也。”<sup>②</sup>孔胤植为崇祯本《三迁志》作序时也说“天欲为古圣王寄心传,特生圣祖;更欲为后贤杰维学脉,再生亚圣。”<sup>③</sup>上述文献,皆在宣扬孟子与孔子的紧密关系,这是唐宋以来孟子地位日益隆升和孟氏借助家志强调孔、孟一道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昭示了孔、孟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关系。

总体观之,明代《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的修纂过程中,之所以会反复出现“群聚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孔、颜、孟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互联互动的共同体特性,以及时人对三者道统一系的认同与宣扬。万历二十三年,姚思仁作《〈宗圣志〉序》称“《阙里志》志尼父也,《陋巷志》志颜,《三迁志》志孟,称鲁三大志,而观者比于云亭、徕甫之配岱宗云。”<sup>④</sup>即言明了《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的一致关系,三志修纂过程中“群聚现象”的出现,即是受这一关系的驱使。三志之中,《陋巷志》和《三迁志》对强化孔、颜、孟三者整体性的诉求更为迫切,二者都希望重申自身与孔子的关系,来利用这一文化资源,提升自身地位。孔氏十分积极地回应颜、孟二氏的诉求,目的是使这一文化共同体更为巩固。

孔、颜、孟三氏家族志的修纂与三氏林庙的修筑相辅相成,也是直接促使明代《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在修纂过程中出现“群聚现象”的重要因素。弘治十二年孔庙因被雷击毁而御敕重修,正是在“重建阙里孔庙成,东阳奉敕代告”时,李东阳“周览遐慕,欲为一书”,并以修庙余资刊刻《阙里志》<sup>⑤</sup>。弘治十五年,颜庙倾颓,颜公铉请旨修复。此后曹来旬谒颜庙遗址,因未有专志而主持修纂《陋巷志》,并在正德二年与颜庙修复工程同时讫工。嘉靖三十一年,史鶚在纂修《三迁志》的同时,还整饬孟氏庙宇林墓,刻石记之“遗塚云亡,值孔道辅求而得之,镇我东鲁。朱令徐土,改设庙楹,望之可畏,英气如生。……予莅邾城,吊塚礼裔,专纂志书,备载世系。”万历三十九年,“值肖山胡侯,重道崇贤,既已举孟子祠墓及子思书院,修筑聿新,而犹以志之未详,未足以征文献也”<sup>⑥</sup>,胡继先遂主持重修《孟志》。孟承光作《〈孟志〉跋语》也叙述此事“曰者,庙庭芜蔽,家志讹乱。西蜀肖山胡侯来蒞兹土,慨然新庙貌、饬林墓,捐贲经理,笃志尊崇。属笔潘周二君子,旁搜载籍,大补前志之缺俾。”<sup>⑦</sup>由此观之,修庙与修志乃是一个整体工程,都是发扬圣门、崇尚儒学的举措。

① 史鶚《〈三迁志〉序》,见史鶚等编《三迁志》。

② 黄克缙《〈孟志〉前序》,见吕元善、吕兆祥等编《三迁志》。

③ 孔胤植《〈三迁志〉序》,见吕元善、吕兆祥等编《三迁志》。

④ 姚思仁《〈宗圣志〉序》,见吕兆祥重修《宗圣志》,明崇祯刻本。

⑤ 李东阳《〈阙里志〉序》,见孔承业、孔弘干等编《阙里志》。

⑥ 潘榛《〈孟志〉后序》,吕元善、吕兆祥等编《三迁志》。

⑦ 孟承光《〈孟志〉跋语》,吕元善、吕兆祥等编《三迁志》。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一次“群聚现象”的出现都与孔、颜、孟三氏林庙修筑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据嘉靖三十四年殷士儋《重修阙里林庙记》记载,嘉靖三十一年,御史冯公倡议重修阙里林庙,“经始其年十月,粤癸丑六月讫工”。此年孔承业等人虽重纂《阙里志》,但该书已于时年仲秋八月完成,故此次纂书与林庙重修无关。天启二年孟庙重修,《三迁志》也在不久后刊刻完成,然此本《三迁志》乃吕元善于天启二年之前始修,故修纂源起与修庙也无关系。明代《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的众多序跋中,在叙述家族志纂修源起时,也有很多并未涉及到林庙的修建。这就说明,林庙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成了三氏家族志的修纂,但并不是“群聚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的修纂亦与明代的修志之风有关。在明代推崇儒家的大背景下,儒学向地方志的渗透已彻底完成,儒学的受众随着地方志的修纂,由精英群体逐渐走向普通民众,修志遂成为教化民风的重要路径,于是修志之风盛行,孔、颜、孟三氏也为这一风气所渐染。修志风气与政治导向相结合,为《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在修纂过程中“群聚现象”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由上可知,在孔、颜、孟三氏家族志编纂者的文化观念中,孔子、颜回和孟子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映射到三氏家族志的修纂上去,促使修纂者在《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的编纂过程中相互模仿借鉴。反过来,修纂者又通过建立家族志之间的紧密联系,宣扬、巩固孔、颜、孟三氏在儒家文化中的一体地位。这就是三氏家族志在修纂过程中频频出现“群聚现象”的内在逻辑。此外,明代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孔、颜、孟三氏林庙的修建,以及明代志书修纂风气盛行等因素,都是促成三氏家族志修纂过程中“群聚现象”出现的文化动因。

#### 四、结 语

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过程中“群聚现象”的出现,本质上体现的是孔子、颜回和孟子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关系。在明代尊崇儒学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孔子、颜回和孟子的特殊关系,转变成成为曲阜孔氏、颜氏和邹县孟氏三个家族之间的关系。三个家族通过不断修纂家族志,宣扬自身作为儒家文化“圣地”的特殊地位,以此获取家族政治、文化利益。为了巩固这一利益,强调孔子、颜回和孟子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阙里志》《陋巷志》和《三迁志》的纂修意旨以及三者之间的交集和互鉴方式,成为孔、颜、孟三氏共同认可的方式。虽然我们强调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过程中“群聚现象”所隐含的现实利益,但不能否定的是,在这一文化互动中,文化认同成为孔、颜、孟三氏最为重要的纽带,孔子、颜回和孟子作为儒家文化体系中的联动性和整体性关系是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田 然)